

# 大国政治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JOHN J. MEARSHEIMER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东方  
编译  
所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 大国政治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JOHN J. MEARSHEIMER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政治的悲剧/(美)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J. J.)著;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SBN 978-7-208-07631-0

I.大… II.①米…②王…③唐… III.①国际关系-研究-现代②国际政治-研究-现代 IV.D81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356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大国政治的悲剧**

(新一版)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0.5 插页 4 字数 446,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7631-0/D·1331

定价 46.00 元

# 序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一部严肃的国际关系理论专著，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它被认为是自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后现实主义又一里程碑式的著作，但往往被简单地视作对“中国威胁论”的阐释，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落脚于应对欧亚大陆可能出现的地区霸权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一美国式的经典命题。作者强调在21世纪初，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中国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并提出美国应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这只是其长期理论研究的现实推测，并非专门针对中国。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无论哪个国家在21世纪崛起，并且实力与美国旗鼓相当，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在作者的分析中，中国恰巧是将在21世纪崛起的国家，故而根据其理论逻辑，作者认为强大的中国会对美国构成挑战。作者的结论只是其理论逻辑的自然延伸，而非作者在主观上认为中国会成为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对此，希望读者以成熟、冷静的心态对待其结论。

和美国国内政治一样，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也具有某种“钟摆效应”，往往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学派之间谋取中庸之道。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学界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一度为乐观的自由主义所支配，世人也曾翘首以盼多极化局面的出现。但近年来，现实主义却有卷土重来之势。首先是“一超独霸”的观点盛极一时，一些大国争相讨好美国，奉行“跟着强者走”战略（bandwagon），而美国则积极推进霸

权战略。沃尔福思的“单极稳定论”思想首先揭开其序幕，库伯的“新帝国论”更是大张旗鼓地为帝国辩护。“一超独霸”的观点还远未偃旗息鼓，“9·11”事件后，人们又开始为另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忧，那就是，在美国，现实主义又悄然披挂上阵，新版的现实主义越来越带有浓重的保守性和“进攻性”（自由主义则被美国国务院规划室主任哈斯发展为“整合论”）。它突出表现为“一超多强”论，特别强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具有不可避免性，其理论基础就是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所阐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sup>1</sup>

与米尔斯海默于1990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为什么我们会很快怀念冷战》一样，《大国政治的悲剧》对历史的解释往往比对未来的预测更可信，诚如译者在评论中所指出的，前者也有观念取材的问题。因此，我们对待此书，应以关注其实证分析过程，丰富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理解为根本，而不要局限或拘泥于其预测或某些言论。我们将《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介绍给国内读者，不仅是希望国内学者能更多地接触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动向，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能够加深对那些可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理论的了解，从而在制定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时能够知己知彼。

此书的理论贡献包括：(1)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在第一章中作者就开门见山地总结了现实主义的三大流派，即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2)毫不掩饰地分析了国际关系现实与理论的关系，尤其是对美国外交言行不一现象的分析发人深省。(3)以军事与理论、历史与理论的完美结合复兴了地缘政治理论。(4)以进攻性现实主义检验历史并验证这一理论，丰富了我们国际关系史的认识。(5)对“均势”(balancing)、“推卸责任”(buck-passing)、“联盟”(alliance)、“讹诈”(blackmail)、“诱捕”(bait and bleed)、“坐观血腥厮杀”(bloodletting)、“绥靖”(appeasement)和“跟着强者走”(bandwagoning)等外交行为的研究，深化了传统联盟理论、均势理论和战争理论。

虽然很难评估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对包括美国国防部决策层在内的美

国保守势力有多大影响,但该书的出版恰逢“9·11”事件后不久,其保守主义历史观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正好与国防部保守派占上风的布什政府外交理念相吻合。例如,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提出了基于能力而非意图的威胁观,又比如对中国的防范等,但我们不应将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与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等混为一谈,或者把进攻性现实主义视为布什政府的指导思想(米尔斯海默甚至反对美国武力“倒萨”,而主张对伊拉克实施“警惕的遏制”,同时主张“反恐”应推行“赢得人心的战略”,反对“先发制人”的战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各流派折衷的产物,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及世界局势的综合考虑,而非以一种思潮为主导,不变的只有美国国家利益和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目标。正如译者指出的,本书是“为永葆美国强权开药方”<sup>2</sup>。

但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频繁,而外交理念相对固定,反映了当权精英对世界的认识,改之不易,因此,我们要更加充分地关注此书所阐明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及其所代表的美国对外政策理念。在2002年4月8日的采访和对话中,米尔斯海默更是明确提出联合日本、越南、韩国、印度、俄罗斯共同遏制中国的观点。对于中国现在强调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以及实现地区共同稳定和繁荣的问题,米尔斯海默的回答是:“那只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足够发展和强大,所以中国需要这么做。如果将来中国强大了,一定会控制这些国家,限制它们的发展,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sup>3</sup>因此,对米尔斯海默的思想的危害性和影响绝不可掉以轻心。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抹杀国家个性,忽视一国内政,不去了解领导人的意志与百姓所思所想,只能是闭门造车。其所杜撰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为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寻找逻辑基础的现实举措,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如约瑟夫·奈所警告的:“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这种威胁当然是美国感觉的威胁,在实践中处处碰壁、不攻自破。实践是最好的镜子,时间是最好的裁判。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已反复表明,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中国对内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们内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决不会改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不懈的努力。”<sup>4</sup>我们相信，强大的中国必将会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时代在飞速发展，没有永恒的循环逻辑。历史上，欧洲一度被认为是大国战争与和平的实验场，尽管有欧洲和谐时期，但“均势—打破均势—新均势”这一战争与和平的逻辑交替，走不出循环。然而近几十年来，欧洲大国摒弃前嫌，走出了主权国家的循环逻辑，加速推进欧洲一体化，已经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历史的定则。因此，以旧眼光看待新世界难免出错。全球化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应用传统的政治思维衡量。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sup>5</sup>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发展趋势。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应该探讨经济因素对各种外交行为的影响，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等。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使得双赢、多赢等成为有目共睹的现象，大国协调合作正取代传统的均势、联盟关系，世界的共同发展等正成为日新月异的话题。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正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传统的大国博弈也不应局限于中美关系。中美俄三角或三边关系，欧盟、日本、印度的作用都必须得到充分重视，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轻视国际组织和联盟因素是不恰当的。

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势头，双方合作的领域得到了扩大，尽管两国间仍存在着不少分歧。但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我相信，中美两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去求同存异、逢凶化吉，保持两国关系的相对稳定，造福于两国人民，造福于世界。

总之，“9·11”事件后，大国关系规则本身在变，再以传统的威慑、遏制思想来描述现时代的大国关系，显然不合时宜。传统的世界战争与和平逻辑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智慧不断超越历史的无奈——况且现实世界

和历史并非那么灰暗。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和世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倪世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2002年12月3日

**注 释**

1. 王义桅、唐小松：《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评米尔夏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载于《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

2. 王义桅、唐小松：《为永葆美国强权开药方》，载于《文汇报》2002年11月8日A.3。

3. 参见 <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people2/Mearsheimer/mearsheimer-con6.html>。

4.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1页。

5.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7页。



# 大国政治的悲剧与 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

——评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sup>1</sup>

——马克思

一个幽灵，自由主义的幽灵，曾在西方上空徘徊，人类历史上还很少在一个旧时代——最为恐怖的冷战时代——终结时能聆听到如此悦耳的葬礼进行曲。“历史终结论”、“大战过时论”、“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和平论”等在过去的十年中一度甚嚣尘上——似乎康德式的永久和平就要在这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时刻实现了，人权取代主权成为界定国际政治认同的标识；虽然其间也夹杂着“文明冲突论”的不和谐音调，但传统大国政治的逻辑似乎为全球化的新时代所超越。

马克思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sup>2</sup> 冷战终结十年后，在芝加哥学派的摇篮——芝加哥大学（半个世纪前曾诞生奠定国际关系理论大厦根基的汉斯·摩根索），出了一位现时代的摩根索——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

\*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王缉思两位老师以及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学生王元纲博士对本文的批评指正。

Mearsheimer)。在其力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这位美国国际关系的杰出学者指出，旧制度、旧时代的逻辑依旧，国际政治仍然是大国政治，依然处于悲剧式的历史循环中。这本书重新唤起了人们的悲剧意识，给世人带来了不安；特别是书中阐述的“中国威胁论”，更是将我们的不安引发为躁动。<sup>3</sup>

《大国政治的悲剧》不仅是对乐观的自由主义的回应，更是作者在“十年磨一剑”基础上系统阐述其学术思想——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代表作，这是“继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后对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理论的最重要贡献……此书论述清晰，极具可读性，它将成为许多国际关系课程的标准教材”<sup>4</sup>。事实也的确如此。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新闻界的广泛反响，美国许多大学已经把本书列入了国际关系课程的参考书目。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权力分配决定了大国政治模式，影响联盟的形成；大国意志在陆地上的表现是成为地区霸权(为了最安全的生存)，而水域的阻遏力量(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使全球霸权不可能实现；大国政治的历史是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s)间冲突的过程，尽管全球霸权无法实现，但大国一刻也没有停止这一企图，因此大国间处于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实现(美洲)地区霸权的国家(拿破仑、希特勒、苏联和日本曾先后试图在欧亚大陆建立地区霸权，但都失败了)，它扮演了一种“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sup>5</sup>的角色，以防止出现任何地区霸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将不可避免，因而作者反对接触而主张及早遏制中国。

实际上，早在10年前围绕冷战终结的争论中，米尔斯海默就发出了“为什么我们很快就会怀念冷战”的惊人论调。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大论战中，他一直扮演着重量级的角色，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言人。<sup>6</sup>

如何认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译者认为，把握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有三个维度，即科学、假说和理念三层面，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科学性一面，也有其假说性一面，同时也是理论倡导者政治理念的一种自然流露。

作为科学层面的理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指出,大国关系最本质和最终结性的因素是激烈的安全竞争乃至战争。正如军事力量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一样,“有关世界如何运作的普遍性理论在决策者辨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选择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时起着重要作用”<sup>7</sup>。进攻性现实主义即是这种具有科学内涵的普遍性理论。

作为假说层面的理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世界作出了许多假定(比如他认为大国在面临威胁时往往会采取“推卸责任”而非“均势”策略),并结论性地推测:“在可预见的将来,或许是二十年内,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当今全球力量结构的巨大变化,将导致大国安全竞争的加剧,甚至爆发大国间的战争,最可能的冲突将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此书虽于2001年10月“9·11”事件后推出,但进攻性现实主义仍坚持认为,满足于反恐政治需要而建立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并不能应对未来。正如《经济学家》的书评所断言,“可怕的恐怖主义(megaterrorism)并未损害他的观点”<sup>8</sup>。

作为理念层面的理论,和其他理论一样,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带有浓重的美国情结,是美国例外论的现实主义阐述。该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是美国精英意识的一种流露,值得关注。

为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力图提供两个视角,试图解答三个问题。两个视角是:(1)从理论到理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看国际关系理论演化律;(2)从理论到实践:任何理论都是从不同视角看世界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因此它要回归现实本身,综合起来考察理论与美国的关系,即该理论多大程度上忧美国之所忧。三个问题包括:(1)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2)解剖麻雀,理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及与实践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3)如何正确对待米尔斯海默主张的“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及中美关系未来的预测。我们将顺便论及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小布什政府战略理念的关系,把进攻性现实主义纳入时代变迁的大框架来讨论,那就是“9·11”事件带给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重大反思——如何对待美国力量,如何解决美国力量的悖论问题。

## 何谓“大国政治的悲剧”？

何谓“大国政治”、“悲剧”和“进攻”？正确理解这些核心概念是客观、准确地把握本书中心思想的必要前提。

米尔斯海默强调，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sup>9</sup>

那么，何谓“大国”呢？“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sup>10</sup>

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sup>11</sup>。所谓“悲剧”，其涵义有二：其一，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博弈——这是悲剧的必然性：“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sup>12</sup>根据这种悲观式、循环式的历史观，米尔斯海默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指出，鉴于中国实力的日益增长，它最终会在亚洲提出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存在。

其二，进攻性企图和权力与生存的不恰当紧密结合导致悲剧的恒久性：“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sup>13</sup>这种悲剧的持久性是以其彻底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即不管大国的性质如何，都会遵循这种逻辑。故此，作者在第十章分析了中国威胁的可能性，比历史主义将中国类比于两

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去挑战国际体系具有更一般和更深远的内涵；其所谓“中国威胁”并非简单地指中国威胁美国霸权，而是试图阐明大国政治的悲剧性与国际关系的悲观前景。本书是从历史悲剧的高度来探讨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体现了历史、理论与现实的完美结合，堪称现实主义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继续写道，没有人有意预设和构想这种局面真是一个悲剧。虽然大国没有理由彼此攻击——它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但在该体系中，它们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这一困境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被普鲁士政治家奥托·俾斯麦以残酷而直率的言辞作了表述。当时，并非独立国家的波兰正想夺回自己的主权。对此，俾斯麦说：“无论以何种形式恢复波兰王国，都无异于给任何选择攻击我们的国家塑造了一个盟友。”因此他主张普鲁士应该“打碎那些波兰人，直到他们丧失希望，一个个倒毙在地；虽然我对他们的处境非常同情，但是我们要想生存，除了铲除他们别无他法”。

大国政治的悲剧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必然结论，那么，何谓“进攻”？这主要指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的世界，大国关系本质上处于进攻状态：“这就无情地产生了一个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的世界：如果国家能获得超过对手的优势，它们就不惜撒谎、欺诈甚至动用粗暴的武力。在这里人们看不到宁静及彼此和睦相处的状态。”<sup>14</sup>

从感情上而言，作者并不喜欢这种局面，但他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客观逻辑使然；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悲观理论”<sup>15</sup>。因此，大国政治的悲剧是米尔斯海默悲剧式历史观、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 米尔斯海默：承上启下的现实主义者

国际关系理论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东西方的先哲如孙子、寇蒂利亚、修昔底德等。这些先哲们几乎都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他们的思想比较多地与战争、权力政治等联系在一

起。事实上,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人们在反思一战后“二十年危机”(1919—1939年)的基础上,经英国学者 E. H. 卡尔批判威尔逊“理想主义”思维而初现轮廓,而后又由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奠定其理论大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两大基本流派——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断深入论战中厘清其内涵与外延的;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一以贯之的理论,自由主义等更多是以批评、补充的面貌出现,其理念还“常常被贴上‘乌托邦’或‘理想主义’的标签”<sup>16</sup>。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问题虽林林总总,但其焦点不是围绕人性—国家性—国际性三个层面展开就是其引申和发挥;人性之善恶、国家是否为国际关系的唯一行为体、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原教旨倾向与修正性企图,是区分这两大流派的根本,并集中归结为权力与道德的矛盾——政治现实主义之父马基雅弗利实现了权力与道德的分离,而自由主义试图结合之,产生出诸如康德“永久和平”的思想。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上,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和平可以实现,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战争难以避免,从而展示了两派信念之乐观—悲观的根本分野。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作为理论的科学层面,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对国际关系世界的部分真理性阐释与描绘;作为理论的假说层面,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在“片面中追求深刻”的逻辑中各执一词并有通约化趋向。

两者的本质区别存在于理念层面。现实主义思考的是世界的客观层面——自在世界,试图洞察国际关系永恒的本质与终结性因素——恰如军事作为确保国家生存的最后手段一样;也因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现实主义往往得出悲观的结论。<sup>17</sup>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仍然难以去掉这一逻辑。<sup>18</sup>故此,现实主义强调历史的、军事的因素与影响,侧重历史的必然性因素。

而自由主义思考得更多的是主观层面——人化世界,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和能改变客观世界的终结性力量,因此它重视历史的偶然性。与现实主义思考国际关系的“实然”不同,自由主义侧重探讨世界的“应然”层面;与现实主义忧心忡忡于国家间非正常交往方式(战

争等)不同,自由主义关注于国家间交往的正常方式——经济、贸易、合作等主题。

因而,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理解起来不可偏废。对待现实主义不能套现实细节与人性因素,对待自由主义也不能苛求世界的客观性。这也是对待其他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应有的态度。兼具学术研究 with 外交实践经验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的话可能更能给人以启示,她不久前谈到了外交政策思想中所谓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学说的争论:“作为一名教授,我知道这方面的争论使一代又一代学者获得终身教职,事业有成。而作为一名决策者,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的分类抹杀了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与价值观完全密不可分。”<sup>19</sup>

然而,和任何其他人类思维形式一样,理论一旦形成,都具有原教旨倾向,即通过不断否定对立面来肯定自身,以获得现时代的合目的性。<sup>20</sup>

米尔斯海默既继承了霍布斯政治现实主义原教旨倾向(将霍布斯关于国家内部的权力扩张关系引申到国家间),又结合了华尔兹的结构性思维(最主要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竞争,甚至还深受华尔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如权力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权力—货币关系——“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家为之争斗”<sup>21</sup>);最重要的是,他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终结性理念——“我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把这种力量看成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sup>22</sup>,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及其流派间的论战中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这些论战,表面上是各派理论围绕科学与假说层面的争论,但更本质的是理念之争,即主导国际关系长达数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悲剧性逻辑在全球化时代是否仍将继续还是将得以超越?

权力是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国际关系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是权力政治学,这正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要告诉我们的。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正是对“国家为什么在乎权力以及它们想要多少权力”问题的不同回答。

本书围绕六个问题对权力展开讨论。第一,为什么大国想要权力,国家争夺权力的根本逻辑是什么;第二,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多少权力才是足够的;第三,什么是权力,这一核心概念是如何定义和度量的;第四,当

一个大国威胁要打破均势时,国家以何种策略获取和维持权力;第五,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何种权力因素使安全竞争的加剧及进而导致的公开对抗更容易或更难以发生;第六,在什么情况下,受威胁的大国会采取均势策略以对抗危险的敌手,在何种情况下又会企图把责任推卸给另一受威胁的国家?

书中,作者根据“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是什么”、“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将现实主义分为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并在表 1.1 中作了区分。

人性现实主义,有时又被称作“经典现实主义”。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将国家性等同于人性,强调国家的“权力欲望”,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是体系中的“权力意志”。

防御性现实主义又常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摩根索不同,华尔兹认为国家的内在侵略性并不是由于被灌输了权力意志,而是为了追求“生存”这一目标,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使其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因为“过多的权力”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联合抗衡。因此,守住而不是增加权力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

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是围绕着人们对结构现实主义的诘难发展起来的。在《为什么我们很快会怀念冷战?》一文中,米尔斯海默继承华尔兹的衣钵,断言冷战的终结、两极体系的崩溃将使世界进入权力纷争的时代,人们将很快会怀念冷战期间两极主导下的和平。这一思想在其又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回到未来:冷战后欧洲的不稳定》——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

在较近的一篇文章《国际制度论的虚假前提》中,米尔斯海默引发了围绕冷战结束而展开的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第三波,<sup>23</sup>这是冷战结束后新形势下直面“自由制度主义、集体安全和批评理论”挑战的现实主义回应。本书则更明确地指出“现实主义将为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提供最有力的解释”<sup>24</sup>。米尔斯海默的这些有影响的文章,是在全球化时代被冷落的现实主义以原教旨意义的反弹,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扩大了现实主义学派的影响。



## 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言人

围绕冷战结束的争论，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以及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通过集中关注名为“进攻—防御平衡”的结构概念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个案提供支持。他们指出，无论何时，军事力量都被划分为偏重进攻和倾向于防御两类。倘若防御明显强于进攻，征服将变得困难，那么大国就不会萌发用武力攫取权力的动机，而是集中保护它们已经拥有的权力。当防御占优势时，保护已有的权力就更为容易。相反，倘若进攻更易于得手，国家就非常渴望征服他国，那么体系中出现频繁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不过，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进攻—防御”平衡常常向防御的方向严重倾斜，从而让征服变得极其困难。总之，建立充分的均势加上防御比进攻所具有的自然优势，应该能打消大国寻求侵略战略的念头，而使其成为“防御的倡导者”<sup>25</sup>。

作者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相反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sup>26</sup>

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在他们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正如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思考，有时则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sup>27</sup>。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主张国家一味推行扩张